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弘文一水石

年谱长编



陈宇◎魏琳

 蓝天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孔子年谱长编

年谱长编

上卷

陈宇◎编著



蓝天出版社

# 前言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1934~1936年间，中共中央机关和红1、红2、红4方面军、红25军共约20万人，陆续撤离原各革命根据地，从长江南北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跨越万水千山，粉碎百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转战10余省，最远的行程二万五千余里，历时整两年，经过长征的数路红军共约8万人在陕北实现胜利大会师，创造了惊天动地、令后人感佩的英雄业绩。

## 1 红6军团拉开长征序幕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赣南闽西苏区、中央苏区）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红1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探索道路，于1934年7月初以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根据地。这支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北上，转战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宣传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国民党军、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

压力的目的。于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于7月23日命令红6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在湘西活动的红3军（1931年由红2军团改编）取得联系，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的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 2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推进。红军第5次反“围剿”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已经完全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施战略大转移，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开始陆续西进。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于都等地出发，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

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至11月15日，红军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

这时，国民党军以16个师的兵力“追剿”西进的中央红军，蒋介石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和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互相推诿，各自行动。这种情况，极为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红军领导人博古、李德等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仍处于十分被动的不利地位。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沿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4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兵力损失过半，锐减至3万余人。

### 3 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边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调集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红军抵达湘黔边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sup>①</sup>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放弃了到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原计划，改向贵州腹地进发，避免了即将招致的全军覆灭危险。12月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制定了红军此后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3月，组成了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境内迂回穿插，伺机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月19日，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

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此后，国民党军改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又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日~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红军在四渡赤水过程中，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

<sup>①</sup> 遵义，县名，在贵州省北部。1949年以遵义县城区设遵义市，保留遵义县。

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

3月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突然出敌不意，于31日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把紧随之后“追剿”的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以北。

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大定、水城、宣威西进，于5月5日~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 4 强渡大渡河

红4方面军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活动，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向西转移。该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5月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5月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和先头部队红4团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两岸前进的红军部队，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相互配合，于29日下午夺占泸定桥。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 5 红1、红4方面军会师川西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4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红4方面军一部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4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

还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298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底，红25军激战独树镇，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取得了庾家河反击战的重大胜利。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根据地。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灭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过陇东，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2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4方面军北上，于7月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血战四坡村。转而北进，于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与红26、红27军会师，相继合编为红15军团。

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前情况，提出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作为战略方针，然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4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在此前后，毛泽东等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

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日~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 6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陕甘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9月10日，毛泽东等率领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夺取天险腊子口，相继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

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先期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日~24日，红1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3次“围剿”，为中共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 7 红4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他在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寄希望能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10月8日~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



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日~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关地区同川军10多个旅激战7昼夜，虽然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1万人。

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

## 8 三大主力红军陕北大会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战术，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经4个月的转战，于1936年3月28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胜利结束了乌蒙山回旋战。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4方面军会师。红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日~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4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红2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2、红4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1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4、红2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1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战斗。红1方面军主要有：湘江战役、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激战腊子口、直罗镇战役。红2方面军主要有：突破澧水沅江封锁线、转战湘黔滇、乌蒙山回旋战、陇南进攻战斗。红4方面军主要有：强渡嘉陵

江战役、千佛山战斗、毛儿盖战斗、包座战斗、绥崇丹懋进攻战役、天芦名雅邛大进攻战役、岷洮西进攻战役。红25军主要有：独树镇战斗、庾家河战斗、袁家沟口战斗、四坡村战斗、劳山战役。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主要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泸定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

## 9 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正如继埃德加·斯诺之后全面地向世界介绍这一壮举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所完成的这场整两年的远征，历经曲折，转战14个省，大小战斗数百次，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缺衣少食、身体虚弱等诸多困难，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征服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10余座，3次穿越人迹罕至、环境恶劣的茫茫沼泽水草地，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军利用雪山草地困死红军的企图，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坦途，将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地区。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以其特有的伟力推动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车轮。

长征的历史证明：（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长征胜利的首要条件。只有坚持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2）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等领袖统筹全局，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并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适时改变战略方针，从而达到了实现战略大转移的目的。（3）红军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长征胜利的思想基础。广大指战员在漫漫征途中，面对各种险恶的环境，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他们靠着英勇牺牲、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冲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越过一道道艰难险阻。（4）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团结，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在各次重要会议上，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都显示出了中共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紧密团结，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共同

对敌。长征中红军兄弟部队之间的阶级友爱，使红军成为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铁流。(5)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前提。红军一切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在苗乡、藏区、羌寨、回地，红军将革命的星星之火撒播于广阔的土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更加全面和系统化，并且真正得到实践检验，为以后在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宝贵借鉴。红军与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用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路军民团结的颂歌。

## 10 伟大的长征精神

红军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迈动双脚，纵横大半个中国，历尽千难万险，终于绝处逢生，华丽转身，转败为胜，从胜利走向胜利。万里征途中，他们表现出了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诚，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他们表现出了超人的胆略和指挥艺术，调动敌军如玩股掌之上，纵横驰骋于万水千山之间；他们表现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务实求真；他们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他们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和钢铁般的意志，不怕吃苦，甘于吃苦，坚定无畏，战胜困难，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他们表现出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高尚品德，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尊重和服从真理；他们表现出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精神，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凸现出了“坚持、吃苦、牺牲、求实、团结”5个显著的特点，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1) 贵于坚持，百折不挠的革命理想信念。红军能在长征中拖不垮、难不倒、打不散、挫不败，并表现出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坚信革命事业必胜的自信心，是最根本的精神支柱。无论是敌军的追堵重围，还是险关隘口、雪山草地，他们都能坚持，坚持，再坚持，直至走向胜利。理想与信念的神奇力量，使这支武器装备低劣、食不果腹的队伍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创造了一个个出神入化的奇迹。

(2) 勇于牺牲，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红军长征不是在平常环境中进行的，几乎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在毛泽东等领导和指挥下，钢铁般的红军运用灵活机

动的战略战术，以非凡的勇气，斩关夺隘，打了很多壮烈的激战、恶战、险战。血染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突破腊子口，转战乌蒙山，鏖战嘉陵江，大战百丈关，激战庾家河，击退上百万装备优良的追兵阻敌，红军始终充满了冲天英豪气概和壮士献身精神。没有哪个历史时期有如此气壮山河的大无畏群体壮举，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命运竟系在是否能夺取几只渡水的小船和数道关隘上。

（3）乐于吃苦，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红军在没有后方基地和物资保障的征途中，在超常态的恶劣自然环境中，衣食极其匮乏，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栉风沐雨而饥寒交迫，几乎处于绝境，而红军指战员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激情，斗志顽强，吃尽天下苦，历尽世间难。如今，“苦不苦，比比长征二万五”，已经成了人们在困难中激励自己的格言，长征已成为吃苦最多的代名词。特别能吃苦，是长征精神的最显著特征。

（4）重于求实，坦诚自纠的独立自主创新胆略。长征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遵义会议则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转折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以卓越的创新胆识，解放思想，服从真理，大胆负责，敢于违上，坦诚认错自纠。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党的大政方针，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主义，制定了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在此后又多次根据客观实际改变战略方针，中国革命奇迹般地从失败走向胜利。这种务实精神的突出作用和牵动全局的独立自主求真胆略，凸显于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全程。

（5）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崇高品德。征途中，数十万名红军将士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各路红军部队之间、干部战士之间、上下级之间，都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互助友爱，团结战斗。全国红军在长征结束后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中共中央在此间虽然经历了重大波折，但特别讲团结的精神使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主要领导人的更换而出现分裂，表现了崇高的党性原则、顾大局原则和集体主义。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失败，更愈显出党和红军的坚强团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团结的中共中央即形成于这一时期。这种广泛而坚实的团结，经历了反分裂斗争而求得的全党全军大团结，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领导核心基础和组织基础。

红军将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人类坚定无畏精神的丰碑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建设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长征精神，已经超出国界，属于全社会，属于全人类，举世敬仰。



## 凡 例

本书的编写体例，遵循通常编写“大事记”和年谱长编的惯例，也有一些为适配这段特殊历史而“量身打造”的特例。

一、前延、后续和兼容。本书以编年体“日志”形式，多方位记录红1方面军（中央红军）、红2方面军、红4方面军、红25军的长征历史，还有国民党军追随“陪同”红军长征的全程历史。正文起始时间为1934年10月8日（红1方面军开始长征）至1936年10月22日（红1方面军与红2方面军会师）。鉴于红军长征史的特别之处，前加一段“长征开始前的局面（1934年4月1日~10月7日）”，记录红军长征的缘由、各部队编成序列和红军重要将领的职历，其中主要记录第5次反“围剿”及长征前夕的准备工作；后加一段“长征结束后的新局面（1936年10月23日~12月31日）”，记录红军长征对国共两党历史、国家命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重大影响，其中主要记录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局面的重大作战行动、事件直至“西安事变”，力求完整地展现多路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足迹和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1936年红1方面军的东征、西征，史学界一般不将其归入红军长征史，但鉴于此时段内整个红军的长征还未结束，红2方面军（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还在长征路上，为全面记述和印证长征历史，本书故也适当兼容记录。

二、正文。基本原则是一事一条。同一时间有多条内容，在第一条注明时间后，用“△”符号表示。在一个条目中，尽量完整地叙述一件事。为叙述上的条理化和文字上的整齐划一，少数要事采用“多事一条”的合并同类项方法，如同一天某单位、某人的多件事。根据文中场景，适宜使用“是日”“同日”“当日”“这天”“今日”“本

日”表述同一天发生的事情，不苛求“用词”统一。“年”“月”亦如此。军队番号序列前一般加“第”字，如第1军第2师第3团；通常情况下，红军部队番号前加“红”字以简明文字，如“红4方面军”“红3军团”“红2师”“红1团”等。为避免部队番号和数量混淆而产生歧义，在表示单位数量时加“个”，如“5个团”，而不用“5团”。

### 三、条目排序。

（一）军事武装力量排序：1. 共产党军队。红1方面军（中央红军），红4方面军，红2、红6军团（红2方面军）、红25军，陕甘红军，南方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2. 国民党军队。中央军、正规军按编制序列，地方军按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藏兵（番兵）、马家军、陕军、东北军等顺序，游杂军按长征路线先后地域。一些大地域上的国民党政府地方武装力量，为指向明确，在地方军简称前冠“国民党”以区分，如国民党川军。3. 日军。先记在华军事，后记日本内阁侵华决策。

（二）时间排序：依公元纪年的年、月、日递进排序，必要之处加“民国”纪年补充。少数年份中用“年底”“本年”条目叙事。四季之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简称为春、夏、秋、冬。计分：月初（5日前），上旬（11日前），上中旬（15日前），中旬（18日前），中下旬（20日前），下旬（25日后），月底（31日后），本月（月底后）；春（3月底后）、夏（6月底后）、秋（9月底后）、冬（12月底后）；初春（2月末），初夏（5月末），初秋（8月末），初冬（11月末）；年初（1月底后），年底（12月底后），上半年（夏后），下半年（冬后、本年前），本年（下半年后、一年最后）等20余种表述方法。

（三）日记排序：依时空地域、部队序列及职务顺序。先红军各路部队，后国民党军、地方政府。万里长征路上，“日记”具有即时天候气象记录及部队定位作用，故本书在同一天“日记”的排序上，先按主人公所在地域，后按部队序列；日记跟随同一天的电报、指示及综合大事记排列其后。本书所收录红军将士日记，按所在部队序列及职务排序：①伍云甫（中革军委无线电总队）；②童小鹏（红1军团政治部）；③赖传珠（红1军团第1师、第2师）；④萧峰（红1军团第1师）；⑤陈伯钧（红5军团、红4方面军）；⑥林伟（红9军团、红4方面军）；⑦关向应（红2军团、红2方面军）；⑧张子意（红6军团、红2方面军）；⑨王恩茂（红6军团、红2方面军）；⑩吴德峰（红6军团、红2方面军）等。其“日记”因人不同曾冠以不同的标题，本书统一以书名号冠名《日记》，在个别避免引起歧义的地方用引号标注“长征日记”。

四、简录“对手”的要事。万里长征路，实际上是国共两军共同走过的万里大较

量，记录红军的长征，还要记录对手——国民党军以及各个地方军阀围追堵截红军的全过程，故本书对“敌军”的行动部署以及蒋介石的行踪作平行记录，可佐证，可校验。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同时，记录日本国的侵华战略部署以及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以彰显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总目标，深感中华民族已经处于大战前夕的最危险时刻氛围。国民党军在“围剿”“追剿”红军长征中，番号众多，变化频繁。为规范名称，本书以蒋介石、国民党军方颁布的编制命令正规名称为准。1934年10月7日之前，冠名用“围剿军”“剿匪军”（全称为“赣粤闽湘鄂5省剿匪军”）；1934年10月8日至1935年1月，用“追剿军”；1935年2月1日后，用“剿匪军”。

五、文电档案。在史实记录中，本书尽量较全面地录用“原汁原味”的电报、战报、日记、报刊，尽量保持原貌。（1）原件中有错、漏、衍文的，处理处留有痕迹；脱漏或订正的字词用〔〕标出，无法辨认的字或原件已经表明缺字用□标出。电文标题，依据能体现电报内容拟定及已有常用标题为首选规则。原件无标点符号的，加标点符号。（2）文电发出时间，按档案原件上所注明，确有讹误的查证后作订正并说明。（3）字数较多的文电、文献作适当压缩，取其主要内容。不用或少用后人的叙述语言，以方便长征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直接读史印证，作深入研究，而不被前人“定论”作先入为主的误导。（4）原文中一些使用不当，但不会产生歧义的字，如须、需混用等，不作改动。原文中的一些词组仍沿惯例用原常用词组，如用“枪枝”，不用现行“枪支”。原文除特别需要保留原字体（繁体、异体）的，均按国家颁行的汉字简化字规定用字。（5）统一序号格式，如“甲、乙、丙……”“一、二、三……”“1.2.3……”“A. B. C……”等。对一些固定词组用字作适当调整，如“连系”改“联系”，“连络”改“联络”，“真象”改“真相”等。（6）电文中的“国民政府”系指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此时空特定的“长征时期”，为指向明确，在引文之外，以“国民党政府”指明；电文中的“政府军”，即“国民革命军”，以“国民党军”指明。（7）为求史料详实，文中引用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的许多电报等文献资料，其中有“共匪”“赤匪”“剿匪”“进剿”“追剿”等语，为存史料真相，对类似表述，本书在引文内照录，不作处理，在引文之外加引号，特此说明。

六、规范人名。除文电中的原文之外，尽量用常见的名字，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如用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不用或少用洛甫、秦邦宪、王稼蔷；用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不用或少用蒋中正、汪兆铭、张少卿。萧克等“萧”姓人名，用“萧”而不用“肖”。对易引起歧义的人名，采取加注、括号的方式另行说明。

七、相关大事记。本书中收录部分要事，虽然并非发生在长征路上，选录于此是因其与红军长征史及当时军政大局紧密关联。选录标准是与红军长征、中共命运紧密相关联，仅记述梗概，对事件发展不作详尽展开。适量摘录毛泽东、蒋介石等国共两军将领的军事言论，以反映长征线路的形成和作战指导思想。

八、注释。一是对一些地名、人名、部队番号等的简短说明或补遗；二是对文电、言论的原文出处以及简要说明；三是对个别特别需要详加说明的事件或有争议的条目加以补充，以求对事件的综合完整记述，以便于读者较为详细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凡人物、地名、时间、部队番号等前文已注明的，无变化时，后文一般不重注。

九、长征路的舞台空间非常广阔，上场人员繁多纷乱，队伍编制常变，大事、要事庞杂。全书为在体例上的统一，在不改变原义前提下，对原文中各行其是的一些用语，尤其是错字病句、古奥偏僻用字，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作有视情变通，或加注说明。本书所收录信息量巨大，为与事适宜，与人为善，与史相安，并照顾当代读者阅读习惯，故对个别事例亦作特例处理。

十、记事有异，不一一罗列，经考订取其一，其余作注，酌加介绍。



# 目 录

前 言 / 1

凡 例 / 1

长征开始前的局面（1934年4月1日~10月7日） / 1

1934年 / 1

4月 / 3

5月 / 14

6月 / 19

7月 / 27

8月 / 42

9月 / 71

10月 / 97

1934年 / 107

10月 / 107

11月 / 168

12月 / 258

1935年 / 357

1月 / 357

2月 / 472

3月 / 575

4月 / 693

5月 / 795

6月 / 889